



明州论坛

深圳下坪垃圾场臭气熏天，被环保部点名批评，居民一个月投诉两百多次，甚至将该市人居环境委和城管局告上法庭，申请公开垃圾场建设的环评报告。但该市相关负责人回复，垃圾场环评报告涉密，不宜公开（11月23日新华社）。

刘云山同志日前强调，领导干部要习惯在“聚光灯”下开展工作。深圳垃圾场主管部门的作法显然不符合这一要求。舞台聚光灯照射强度高，照射范围小，台上人物的言语谈吐、举手投足一目了然。提倡在“聚光灯”下工作，其实就是政务公开。这一要求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来了，时至今日，情况仍



另有所思

盖桂保 绘

同志，请到“聚光灯”下工作

□黄明朗

不乐观，说明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实行政务公开，行政行为在社会监督下进行，是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和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领导干部办理的是公事，习惯在群众的“目光”、法律的“阳光”、纪检部门的“激光”下工作，有效地挤压权力寻租空间，防止以权谋私甚至徇私枉法，应该成为必备素质。然而，在某些官员思想深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陈旧观念根深蒂固，把本应公开的事项人为地披上神秘色彩，贴上“保密”标签，捂得严严实实。在党中央要求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今天，这些做法是行不通的。国家发

改委副主任刘铁男被微博实名举报涉案，上海法官集体嫖娼被公诸于众，档案造假骗官的江西鹰潭原团市委书记徐楷原形毕露……这类“避光案件”被一曝表明，在互联网时代，不管你愿不愿意、是否习惯，“聚光灯”客观存在着，想藏也藏不住，想躲也躲不开。领导干部客观上处在“聚光灯”下是一回事，主观上是否习惯则是另一回事。许多同志懂得公开才有公平，透明才会清明。他们把压力变成动力，相信公道自在人心，只要规范操作，公开透明，不忽悠不遮掩，就可以提高自身工作的公信力，提升群众对干部政绩的公认度。反之，一些

同志长期在“光照不足”的条件下工作，对“聚光灯”下压力大、要求高、责任重的环境尚不适应，难免缺乏自觉性，被动勉强，摇摆不定，一不留神又会回到老路上去；有些人选择性强，一旦有精彩的大手笔，便希望万众瞩目，崇尚“聚光灯”照耀，而要是有了败笔，担心缺点、错误被放大，政绩被抹杀，就会耍滑头，把灯光遮挡、弱化，甚至尽量远离“聚光灯”。培养在“聚光灯”下工作的习惯，需要更新工作理念，转变工作方式，尤其是上级应做出样子，树立榜样，并帮助下级总结经验，使之尝到在“聚光灯”下工作的甜头，逐步习惯成自然。毋庸讳言，党内少数居心叵测之

人，干的是与党和人民要求格格不入的丑事、坏事，因而习惯“潜规则”，醉心“天知地知”，甚至一手遮天，肆意妄为。这些人到“聚光灯”下工作，他们就等于在众目睽睽下作祟，就会“见光死”，当然对“聚光灯”抵触情绪严重，自然刻意“避光”。但事实上，让这样的人接受“聚光灯”的曝晒，预防“亚健康”，发现“带菌者”，治疗“患病者”，其实是对其最好的保护。各级党组织要建章立制，不仅要明确政务公开的范围、途径，而且要明确不公开的后果，规范和限制官员的自由裁量权，让“聚光灯”持续通电，全天候发光，全方位照射，发挥震慑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企图玩猫腻者无处藏身，让敢于规避“聚光灯”者付出沉重代价。

「不想腐」是更高境界

□易其洋

自2004年在全国率先提出“廉政文化”概念以来，我市的廉政文化建设已走过十个年头。上周五，“宁波廉政文化建设成果展”在宁波博物馆开幕。笔者看了，有两点感受：一是宁波搞廉政文化建设，历史资源比较丰富；二是廉政文化建设不好搞，宁波动了不少脑筋，取得了一些成绩（见今日本报头版报道）。

对于前者，记住了这样几点：曾任鄞县知事的王安石，清廉高洁，“平生行止，无一污点”；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主张从内心寻理，修身养性，克服“私欲”；“书藏古今”的天一阁，经年不废，与它严格的管理制度密不可分；四明山的“红色记忆”，见证了先辈们“只为民谋、不计私利”的理想信念等。这些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和道德示范，为我们“以文化人”提供了营养和借鉴。

对于后者，有点自己的想法。文化，说简单点，就是生活态度和方式。说复杂点，就是人们生活遵循什么样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台湾作家龙应台说：“日子怎么过，就是文化”，就是“独处时，他如何与自己相处？所有的教养、原则、规范，在没人看见的地方，他怎么样？”廉政文化，就是清廉不腐的为官态度、方式和观念。而为官清廉不腐，无非三种状态：一是不敢腐，二是不想腐，三是不愿腐。

不敢腐，得靠严惩，有腐必惩、有贪必肃。但这终究是“马后炮”，人出事了，事业就误了，群众和国家利益受损了，往往难以挽回和弥补，有时也并不容易达到“以儆效尤”的目的。不能腐，得靠制度建设和监督管理，这在反腐形势依然严峻的当下尤其紧迫。但对为官者来说，“不能腐”的潜台词是，如果“能腐”，何“腐”而不为呢？拒腐成贪被动、消极、难免蠢蠢欲动，“笼子”一松，就可能出事。

不想腐，得靠理想信念教育和廉政文化熏陶。俗话说：千金难买我乐意；古语云：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一正一反，足以说明，如果“清廉”是化在骨子里的自觉意识、坚定信念，心中一点贪念没有，甚至视贪腐为“仇寇”，不先自己不愿腐，也必然看不惯、容不得别人腐。显然，这是一种更难达到，也更值得孜孜以求的高境界。

再好的制度、再严厉的惩罚，最终得靠人执行。心中没有“道德律令”、“廉政文化”，不先“为官者”很容易甚至身不由己地走向腐败，“管官者”、“治官者”也难保不会徇情枉法。反腐败是反贪官污吏，更是反“腐败文化”、“羡慕心理”，既是政治斗争，更是文化斗争。不管是哪种文化，它的形成，无不是一个熏陶浸润、潜移默化的漫长过程。与营造“不敢腐”的高压态势、打造“不能腐”的制度环境相比，更艰难、更长远的是，以这两者为基础和依托，慢慢养成“不想腐”的廉政文化、社会文化。

推进廉政文化建设，挤压“腐败文化”的生存空间，遏制“羡慕心理”的蔓延势头，我们依然任重道远。比如，先是破除有些人“文化是虚的”，搞廉政文化建设耗时费力、见效太慢，“远水解不了近渴”，只是纪检部门的事等错误观念和片面看法，就不是件容易的事。

爱国主义教育就应“细化”

□江海

爱国主义教育怎样才能不流于口号？一名学生怎样做才算爱国？慈溪杭州湾中等职业院校的学生不会为此感到迷茫，因为学校专门制定了“爱国主义教育”的30个细节（11月27日《宁波日报》）。

爱国，是一种朴素而又纯洁，高尚而又强烈的情感。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不断追寻爱国真谛，不停探求报国之门，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诸多感人故事。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爱国？这是需要每个人认真思考和回答的现实问题，也是需要广大教育工作者努力探索和破解的时代课题。

过去，不少学校的爱国主义教育

落入了“口号化”、“抽象化”、“模式化”的窠臼，灌输式、填鸭式的教育方式，使爱国主义教育成了一些学生头脑中概念性的“远大理想”。观照生活，这些“高大上”的理想又变得“骨感”——有些青年人有志于“扫天下”，却不屑于“扫一屋”；有志于报效祖国，却不愿意脚踏实地；有志于奉献青春热血，却不愿意帮身边人一把；有志于服务社会，却不愿意为父母分担家务……这些不良倾向，固然与整个社会的浮

躁有关，但也有畸形的、陈旧的教育理念的责任。“抗职”在学校德育实践中，将爱国主义分解成与学生生活、学习相关的若干细节，在良好习惯的培养中，使学生懂得：一些生活小事也能体现爱国，人人能做对国家有益的事情。这种尝试，很有现实意义。“周一升旗仪式，要大声唱国歌，行注目礼”、“关心国家时事”、“旅行在外，注意形象”……这些细化了的规定和要求，若能长期坚持，内化为行为自

觉，必将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学生的爱国素养。

“抗职”爱国主义教育30个“细节”的独到之处还在于，它不是由学校生硬地“炮制”出来的，而是来源于学生这个主体。学校不过是搭建了一个互动平台，通过集思广益的办法，启发学生自己来找答案。如此一来，不仅提高了学生对爱国“细节”的认可度，也使学生在参与中增强了自我约束、互相监督、互相促进的自觉。

作为一种创新，“抗职”的做法还有进一步总结提高的空间。爱国主义教育的30个“细节”，有些还值得推敲和提炼，有些则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及时进行调整充实，使之更符合时代特征，更具职业学校的特点。

完善法律终结“自考神话”

□朱泽军

“哪怕你是小学毕业，短时间内也可以获得本科证书；一年就能取得名校本科学历。”这种类似天方夜谭的话你信吗？央视记者以考生身份花费数万元在黑龙

江省体验了一把“自考神话”，助学机构的“神通”让人触目惊心（11月26日中央电视台）。众所周知，正常情况下，经自考取得大专、本科等相应文凭、证书，一般需时三年五载，甚至更长。可是在一些地区，居然六个月就能拿到毕业证书，并且是考生想要哪所学校的文凭，就能够拿到哪所学校的文凭。不

过前提，收费高得离谱，文凭费用从9800元到19800元，学位证另加8000元……显然，“自考神话”缘于经济利益作祟。

“自考神话”严重扰乱了教育秩序，黑龙江省当地教育部门自然难辞其咎，需要自省，更需要全面认真核查，并依据调查结果对相关责任人严肃问责。这种自考

乱象并不是黑龙江省所独有，其他地区也不同程度的存在。笔者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目前我国相关法律不完善，只有考试作弊中的关联行为触犯了《刑法》，才可能被以犯罪论处，很显然，打击考试舞弊现象的“门槛”过高。正因为这样，当一些地方或部门发生考试舞弊事件后，多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由于

考试舞弊组织者违法成本过低，在背后强大黑色利益链的驱动下，其在“接受”批评教育之后，仍可不思悔改，重操旧业，甚至“带动”更多人参与其中。

严厉打击各类考试中出现的舞弊行为，是一项紧迫任务。国家立法机关应当考虑弥补这一法律短板，尽快出台一部权威的、针对性和操作性强的国家考试法规，或者在现行《刑法》中增设“考试作弊罪”，为惩罚考试舞弊行为提供有力、更直接的法律依据，对严重违法国家考试管理制度者，及时运用刑罚手段予以制裁。

建筑强市再进发 推进新型城市化

走出去，外面的世界更精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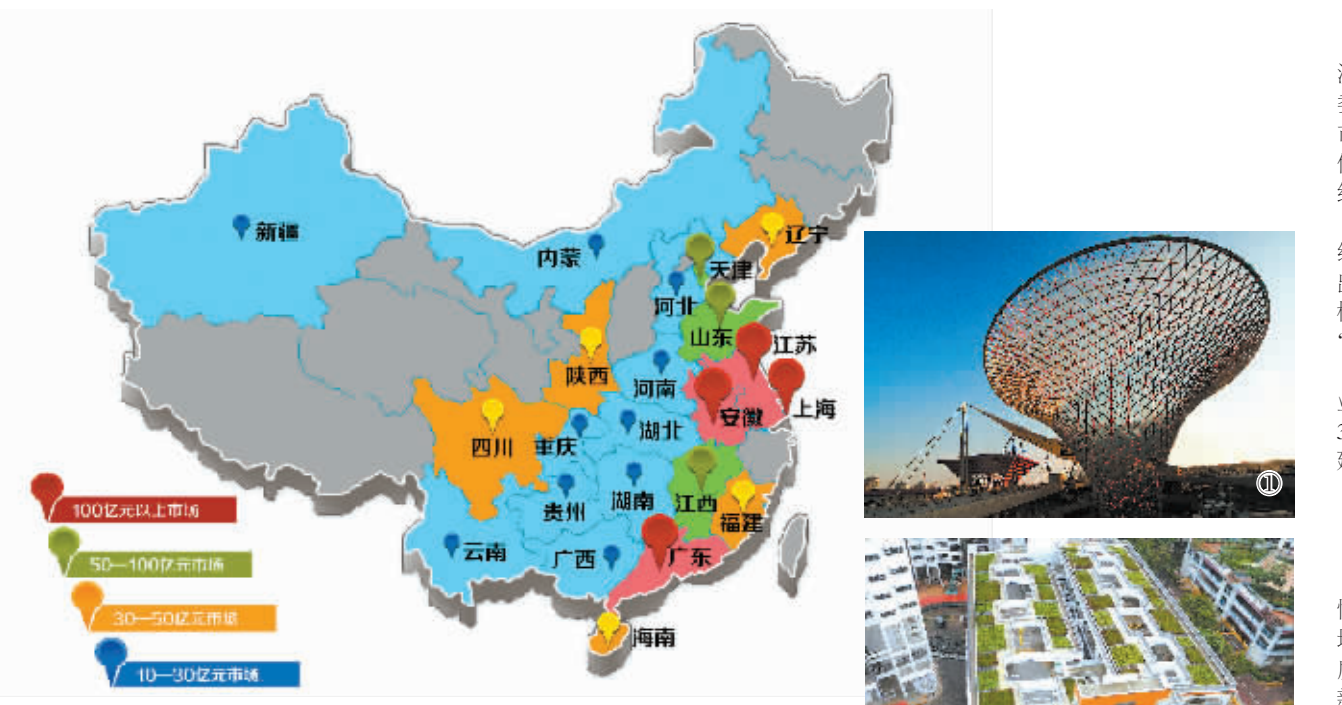
核心提示

宁波，面积不足10000平方公里，却是全国知名“建筑业之乡”。但是，一个地方的开发建设容量终究有限，只有大步“走出去”，宁波建筑业才能成为“常青树”。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建筑业“走出去”，采取各种方式方法鼓励、帮助企业向外开拓市场。2012年，市政府专门在上海召开宁波建筑业走出去现场会，让在上海扎根的建筑龙头企业为宁波企业“现身说法”。2013年，我市借承办内地与香港建筑业论坛之机，与来自内地和香港的300多名代表，就当前内地与香港建筑行业互利合作展开研讨。今年10月，市住建委与市外经局邀请全市建筑业龙头企业与数家大型房产开发企业，举办“走出去”工作座谈会暨促进境外投资培训，就贯彻落实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更好地开拓境外建设市场，加快推动我市建筑企业转型升级发展进行研讨。

象山“先锋队”总部驻上海

宁波和上海地域相邻，人缘相亲，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大批宁波企业家沿着当年宁波帮创业的足迹，踏上了浦江两岸这块中国改革开放最热的土地。但若要算起最早进军上海的企业，还当属宁波建筑行业。上世纪80年代初，象山第一批施工队走出象山来到上海。在近30年的磨炼中，象山建筑队伍逐步从当初翻围墙、挖水沟的“编外部队”成长为一支房建、市政、安装、装饰多业并进，年产值突破百亿的建筑业主力军。“当浦东开发拉开上海大规模城市建设序幕时，宁波建筑企业从中看到了巨大商机，开始在上海各个重点工程工地大显身手，掘得了第一桶金，同时也就此在大上海站稳了脚跟。”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赖朝晖笑称，宁波建筑业或许就是宁波最早实践总部经济战略的产业之一。1993年，龙元集团总部迁址上海。1998年，集团斥巨资兼并了上海建委直属建设公司，开创了外地建筑业企业兼并上海国有建筑企业的先河。“上海市目前三座地下五层开发量的标志性建筑项目，龙元就参与了其中的两项。”赖朝晖说，龙元“走出去”的线路图，就是先在上海打响品牌，再以上海为中心，逐步向外辐射，如今企业足迹已遍及国内20多个省市。

同样来自象山的宏润集团，在上海闹市区盖起了总部大厦——宏润大厦，先后在上海参与了南北高架、延安路高架、浦东国际机场等众多重大市政工程。2002年，宏润集团成功中标上海地铁工程，成为全国首家进入该领域的民营企业。从此，宏润确立了在轨道交通施工和地下工程施工工领域的专业特色，“上海市完工的、在建的重点工程的三分之二，都有宏润的身影。”宏润集团副总经理赵余夫说。将总部设在更大城市，也为企业招揽到了更多的人才，支撑宁波传统建筑业企业逐步向以管理、资本运营为主的更高层次建筑业企业转型。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总部在上海的建筑企业有10多家。其中象山企业就有龙元、宏润、中达、



- ①龙元建设打造的上海世博会世博轴阳光谷，技术难度堪比“鸟巢”。
②宁波建设集团在新加坡接连中标多个组屋项目。

建安实业、华锦、天元、华一等七家。其中“龙元”连续15年保持全国进沪施工企业综合实力排名第一，“宏润”一直处于进沪施工企业综合实力排名前十。

多措并举扶持“走出去”

宁波建筑企业众多，但总体仍存在小、散、弱以及单体开拓市场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等问题。为此，市政府出台的《关于加快建筑业转型发展提升发展的若干意见》及相关配套政策，对走出去建筑业企业给予税收、金融等各方面政策优惠与支持。2011年6月，时任市长的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刘奇在全市建筑业大会上鼓励建筑业牢牢抓住当前新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2012年10月，副市长王仁洲带队专门在上海组织召开宁波市建筑业“走出去”发展工作座谈会，带领宁波企业参观上海建筑工地，倾听建筑业企业在“走

出去”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以及相关意见建议。2013年10月，由住建部、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和宁波市政府组织的“内地与香港建筑业论坛”在我市举办，两地围绕“发展高质创新建造，推动企业走出去”主题，就提高建筑业质量，共同开拓国际市场等问题交流经验、商谈合作。卢子跃、王仁洲等市政府领导亲切看望与会代表，要求加强与香港的合作，鼓励宁波企业积极走出去。

为进一步加大服务管理力度，助推我市建筑业企业拓展省外市场，市住建委联合市经促办积极搭建宁波市建筑业分会平台，通过发挥商会行业自律、维权、协调、服务等作用，形成携手拓展经营新局面。2013年11月，西安区商会建筑业分会正式成立，为我市建筑业企业在陕西省等中西部地区拓展市场搭建平台、提供服务。除此之外，贵州、重庆等地的宁波市建筑业分会也在积极筹划中。针对当前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控，房地产和建筑业市场普遍受到影响，国际大市场特别是许多国家为刺激经

稳扎稳打铸就宁波品牌

鉴于本土建筑业企业“守城”，以及各地市场规则、风俗习惯、人文环境各异的实际情况，外地建筑业企业新进入一个市场并不容易，但宁波建筑业企业硬是凭着雄厚的实力、过硬的质量、诚信的品牌、灵活的运作，在国内外市场开辟出一个新天地。

赵余夫说，宏润首次竞标武汉地铁项目时，采取了与当地国有企业联合竞标的方式，“虽然蛋糕被分走一部分，但从长远看，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市场。”果不其然，由于良好的业绩，我们5月16日宏润成功中标8亿元武汉轨道交通项目，成为公司目前轨道交通项目承接业务单体造价最大的一单。“进入一个新市场，就要深耕，将每个项目做成品牌。”这是每一家“走出去”建筑业企业的自我要求。龙元公司有一条内控规定：在新重点市场承建的第一个项目必须做成样板，要创建当地观摩工地。宁波建工以政府援建为依托，把在四川、新疆等地的工程个个做成精品。

开拓国际市场，更需要以品质取胜。宁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深耕新加坡市场十余年，如今终于成为新加坡建屋发展局A2级承建商和新加坡建筑市场中最大的中国建筑企业。2010年，企业又挺进非洲尼日利亚，承接了多个工业园区的厂房项目。较强的资金实力以及融资能力，也帮助不少建筑业企业敲开了市场的大门。浙江天元建设出资重组中达建设后，实现资本与施工的强强联合，今年在安徽芜湖和舟山分别中标大型商业综合体项目。华恒建设在江西景德镇，以BOT模式（建设—经营—转让）参与了湘官一级公路建设，项目总投资8亿元。

王岚 王大成 文 毛雪娇 制图